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三八期 ——
(二〇〇五年六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6c)

【本刊专稿】为丁盛辩	余汝信
【历史一页】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下)	舒云
【知情者说】陶铸在1966	马恩成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为丁盛辩

• 余汝信 •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走完了他八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虽然官方诸多留难，即使在去世后的称谓上，也处处设限——不能称“同志”，不能提及前任职务，甚至，不能称“红军战士”……，但还是有数百位老战友闻风而至，在听到消息后，不约而同地参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的一副挽联，格外引人注目：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1〕

字里行间，是人们心中的不平。

1、梦回吹角连营

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无疑是将军数十年戎马生涯中闪光的亮点。恰好是在去世前半个世纪的1949年9—10月，丁盛率所部第一三五师，在四野第四十五军编成内，参加湘粤桂战役中具决定性意义的衡宝战役。第一三五师在是役中面对强敌——国军白崇禧部主力第七军，打出了声威，受到四野总部和第十二兵团的电令嘉奖。林彪等在给四野“各军首长转全体

指战员们”的电报中称：“你们西渡湘江以后，动作神速，抓住了白匪的精锐四个师，不顾一切疲劳，日夜继续战斗，与敌反复进行堵击和包围，终于将敌人全部歼灭。这种精神与战斗作风甚为良好，尤其是一一九师、一三五师顽强的堵击与反击了敌人，使敌人数次突围均告失败，更值得表扬”。十二兵团传令嘉奖一三五师：“你们这种不怕艰苦，英勇果敢，坚决执行命令，独立作战的精神，堪称此次战役中本军的模范”。丁盛及其所率一三五师，由此闻名于四野全军。（2）

衡宝战役一年后，丁盛升任第四十五军代军长。不及一载，正式接任军长。1952年10月，第四十五军与第四十四军合编为第五十四军，丁仍为军长。翌年1月，率部入朝，至1958年5月返国，军部驻重庆，隶属于成都军区，为该军区辖区内（四川、西藏）唯一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军。

1959年3月，西藏局势动荡。3月14日，军委令由丁盛组成“丁指”（代号302部队指挥所），率第一三〇师、一三四师赴藏参加平叛。是月，在甘青地区执行平叛任务的一三四师沿青藏公路开进，抵达拉萨、当雄。一三〇师由驻地雅安乘车出发，在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军区前进指挥所（即“黄指”，代号301部队指挥所）率领下取道川藏公路，于4月初进抵甘孜集结。3月27日，丁盛率“丁指”主要成员由兰州乘飞机抵拉萨。“丁指”率一三〇、一三四两师，在西藏高原进行了历时两年半的平叛作战，历经大小战斗978次。至1961年4月，“丁指”方奉命撤销，一三四师离藏入川，驻南充地区，11月，一三〇师亦返回四川雅安。

1962年10月，陆军第五十四军再度组成以军长丁盛为首的前指（亦简称“丁指”），以统一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瓦弄地区作战行动。11月6日，“丁指”进驻西藏察隅，立即落实各项作战准备工作。次日，丁盛召开作战会议，形成作战方案，月中，“丁指”前进至航堆以南地区，率所部一三〇师等向瓦弄印军发起全线攻击。

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是役，“丁指”所部经激战夺回瓦弄，直逼至传统习惯线附近，歼灭印军三个营全部、一个营大部 and 印军第十一旅旅直分队等部共一千二百多人。战后，奉命主动撤至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处。12月下旬，“丁指”返抵重庆，所属部队亦于翌年1月初返抵原驻地。其后，丁盛奉命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瓦弄地区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又率员分赴四川各地作巡回报告两千余场次，再率员到沈阳、南京、广州、兰州等军区汇报，一时间，丁盛及五十四军声名大振。

丁盛指挥作战计划周详，决心果断。所率部队，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以今天的视角回眸昨日，如果说“战衡宝”尚不过是国共之间兄弟阋于墙而无须再多提的话，而“平西康，攻瓦弄”则为应该肯定的捍卫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丁盛作为军一级高级指挥员，不畏难，不避险，三年间两度亲赴西藏前线，成功地指挥了雪域高原上的典范战例，功不可没。

2、困惑的新疆岁月

1964年7月，丁盛离开五十四军，奉调新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3）

大军区副职，似乎是提升了，但实际是挂名的，兵团才是丁盛真正的落脚处。同时调至兵团以“加强领导”的军队现役高级干部尚有：裴周玉，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陆军第六十九军政委），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兵团第三政委；李荆山，空军第二军副政委，任兵团政治部主

任。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虽一直冠之以“新疆军区”名义，但早于1956年即已不隶属军区建制，退出军队序列，改受自治区和新成立的国家农垦部双重领导。军委此际再将挂名军区副职的裴、丁任命为兵团领导，应与当时新疆边境的严峻局势及欲赋予兵团的戍边职责有关。

1962年4月，新疆发生“伊塔事件”，六万余边民外逃苏联。碍于正规边防部队兵力严重不足而又为防止边民外逃继续蔓延，兵团奉命当年5月始紧急组编6个独立营共21个值班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布防堵截并警卫地州党政机关。同时，抽调36个基干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建立边防哨卡、巡逻点、工作站，巡逻边境，劝阻边民外逃。北京方面并决定沿中苏边界建立一条国营农（牧、林）场带。8月，军委有意扩大兵团民兵值班部队，决定兵团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值班民兵连。

兵团人员构成复杂，相当部分为原陶峙岳部起义人员，而又面临艰巨的戍边重任。将裴、丁调来，本意自然是用其所长——裴周玉在六十九军有对原董其武部的长期统战经验，而丁盛则有中印边境作战的丰富军事实践。惟丁盛一到兵团，就明显感觉到在此间开展工作并非易事。

首先，是兵团原领导班子强烈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情绪。初来乍到，别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据丁盛后来对别人说，分配给他这位大军区副职的住房，竟然只有39平方。而这39平方的房子，却要住下丁盛一家六口外加一位保姆。直觉告诉他，人家对他的到来，并不表示欢迎。

再者，兵团领导机关本身作风散漫，机关大院象个大杂院，鸡窝羊圈，堆放杂物，晾晒衣服，随处可见；上班漫不经心，迟到早退，几成习惯，兵团机关对下属不起表率作用。

他曾试图改变此间种种与野战部队截然不同的陋习，但很有点力不从心，毕竟此地不是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部，他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外来户”，并非这里一二号首长——在党内，他仅是兵团党委的十二名常委之一，以党政领导班子排名计，他排在王恩茂、陶峙岳、张仲瀚、裴周玉之后。况且，还未待他想清楚是否还有可能一展所长，文化大革命已不期而至。

运动初期，兵团机关大字报大都指向裴周玉、丁盛两位所谓“新领导”，指称两人为“罗瑞卿分子”、“走资派”。少数人不同意将矛头指向“新领导”，而是揭批兵团“老领导”张仲瀚等。1966年12月间，反裴、丁一派为兵团副政委贺振新在揪斗过程不幸心脏病发猝死一事，再次召开批判资反线大会，要求兵团主要领导参加“说明真相”。经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派丁盛乘飞机紧急赴京向军委汇报。

翌年1月9日，兵团被群众组织夺权。1月26日，兵团农八师所在地石河子发生武装流血事件，死27人，伤78人。为稳定兵团局势，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兵团文革专门发布文件，宣布“决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并作十二条规定，其中提及“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据此，兵团临时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于3月中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裴、丁实际主持兵团工作。6月22日，军委转发中央决定，任命裴周玉为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丁盛为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次月，中央再调陆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孔瑞云、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杜海林任兵团副司令员，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曾如清任兵团副政委。在裴、丁等的努力下，兵团的混乱局面一度得以一定程度的抑制，今天说来，这种抑制必然也付出了对一派施以强压的沉重代价，故此，好景不长，1967年下半年两派武斗再起，

兵团机关亦再度陷于瘫痪。

3、广州军区司令员

文革前，丁盛难于适应兵团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体制，早萌去意，并于1965、66年两次打报告要求调离，但均无下文。面对文革中兵团的乱局，丁甚感无奈，调离的愿望愈加强烈。

据长期担任丁盛秘书的陈宏康告诉笔者，1967年初在京汇报期间，丁住京西宾馆，隔壁是邱国光。邱是黄永胜小圈子里的人，当时虽仅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却是军区党委常委。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场，项提及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军区领导欲在春节期间到林彪处拜年事，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时，丁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当场未置可否。

这次晋见，毕竟还是起了作用。据陈宏康说，丁后来在1967年中便接到调令，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惟据笔者查阅到的官方的组织史资料，丁调广州军区的军委命令，应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达的。

丁盛到任的次月，“杨余傅事件”发生。黄永胜奉调到京，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则仍兼着。丁盛到任前，广州军区还有几位副司令员，但黄永胜显然是将丁视为接班人。当年12月，经军委批复同意，丁盛任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排名于黄永胜（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刘兴元（第三书记、第二政委），孔石泉（第四书记、第三政委）之后（时第一书记陶铸已免职，第一政委韦国清非军区党委成员）。〔4〕

战争年代，黄永胜颇长一段时间是丁盛的直接上级，对丁盛的军事才干，应该十分了解。1944年，黄永胜担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长期间，丁盛为二旅一团政委。翌年11月，组建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丁盛为其辖下二十七旅旅长。1947年，黄永胜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辖下热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当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黄永胜，八纵第二十四师师长为丁盛。1948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八纵改称第四十五军，军长先后为段苏权、黄永胜，丁盛为该军第一三五师师长。直到1949年4月黄永胜调升第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黄、丁才分开。

1969年4月，黄永胜在中共“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丁盛亦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并任由四十九人组成的新军委委员。两个月后，丁盛正式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是优秀的军长。惟以个人能力来说，当大区正职，就有点勉为其难。不过，那时是党政军民学，军人领导一切，由是故，此后数年，丁盛干得还算颇为顺心。这几年中，最具震撼力的，当属1971年的“913事件”，因随后有所谓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一说，广州军区及丁盛本人也就多少受到些风言风语的影响。

1972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有如此说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他们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阴谋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

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拟定了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该材料还引用了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亲笔供词”称：“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再准备一架多坐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5〕

三几架飞机的人就可以另立中央？这总使人有些疑问。以后的清查结果表明，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材料能证实林彪、黄、吴、李、邱知道这一“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更不说有所行动去实施这一“计划”了。亦没有任何材料能证实，广州军区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包括丁盛在内，知道有这么一个“计划”，或为这个“计划”作了任何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策应工作。事实证明，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6〕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7〕

4、厄运之夜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1975年5月，丁盛到武汉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协商研究二十军与一军调防事宜，至当年7月中，顺利完成两军对调防务工作后，军区党委即召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6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军区关于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方案，经初步整顿，军区部队的建设得以加强。8月，经毛泽东、中央批准，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丁盛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仍由张春桥兼任）。11月，丁盛在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了军区作战预案，研究了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及各项保障计划。当月，还组织了陆军第六十军的检验性演习。〔8〕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

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住延安饭店（南京军区在上海的接待处）。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

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

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

“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9〕

笔者的一位友人，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这位朋友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考虑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笔者不能保证她的以上丁盛谈及军事地理问题时记录的准确程度，但大意应该没有问题的）。

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10）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11）

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

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

5、子虚乌有的罪名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12）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13）

据丁盛申诉，他对马、徐、王三人是谈及对江北苏南的情况有些不大放心，但那是针对对外防御作战的战场准备而言，与国内政治问题一点联系都没有。据丁盛回忆，是谈起过六十军及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事，但不在8月8日晚上，而是杭州湾演习结束后，9月3日他再到上海，在延安饭店碰巧又遇到马天水等人。马天水问起，上海市委曾给军区转去一封信，是六十军驻无锡部队一个什么人写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马问丁收到转去的这封信没有，丁回答说收到了，同时说起军区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写给某医院一位护士的，信上说到毛百年后要打内战，丁说，打内战可不得了，军区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送给陈锡联了。（14）

笔者相信丁盛的申诉比较接近历史事实，这理由实在太多。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

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王洪文、张春桥当时是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是军区第一把手。王洪文也挂着上海警备区政委一职。丁要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完全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找他的第一书记。张春桥掌控军队的能力无论如何要比马、徐、王强吧，且应该了解下属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布防情况。丁盛如果真要“密谋”什么，找张岂不更名正言顺？何须绕着弯子要找马、徐、王再去转告？此其二。

南京军区当时辖有三个野战军，一军在浙江，十二军在安徽，六十军在江苏。按徐景贤所言，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他指挥不动，那么，以逻辑推理，言下之意，其他两个军应该靠得住，应该指挥得动（要不丁盛为什么不说三个军都靠不住，他都指挥不动呢）。六十军的军部在镇江，一军的军部在湖州，湖州比镇江更靠近上海，按逻辑推理下去，丁盛岂不是可以拿一军及十二军作资本去投资靠“四人帮”？丁盛有这样做吗？此其三。

张春桥当时还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王洪文亦还兼警备区政委。上海警备区本身就有三个师的兵力（即驻市区的警备师，驻周浦的守备一师及驻松江的守备二师），即使三个野战军都指挥不动，以丁盛加上张、王，警备区这三个师总还能控制，还能指挥得动吧？如丁盛真的参与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密谋，为什么不与马、徐、王议议如何去指挥调动较易于掌控的这三个师呢？此其四。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

6、公道自在人心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其为“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如廖说，他1975年2月接到调令去南京，“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打来的电话，欢迎我速去上任”，又说：“我和彭冲，丁盛都比较熟悉”，“我和丁盛前后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后到陕北红28军当团政治委员。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28军与红2军团第6师合编为第120师第716团，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丁盛任2营党总支部书记。宋时轮团长带领2营开赴雁北地区时，丁盛调到第715团任党总支部书记，以后又去了第115师。1955年，我们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是第2小组组长，他是组员。毕业后，他任第54军军长。1963年，我们一起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军委组织的马列理论学习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学员。……”。（15）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

“我没有搭理。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

“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16）

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廖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17）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异常举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其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

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18）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悦。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19）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却没有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松动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20）

公道，自在人心。（2005年5月）

附：丁盛简历

-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 1932年，由团转党。
-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注释：

- 〔1〕第五十四军驻京老战友联谊会联谊组编印：《难忘岁月战友情》（2001），页334。
- 〔2〕本节内容，参见中共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委员会编：《无敌的铁拳—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史》（1991），成都军区百科编审室编：《西南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西藏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5～1985。8）》（1987）。
- 〔3〕本节内容，参见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办公厅、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史资料（1954。10～1987。10）》（1991）。
-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301—304。
- 〔5〕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2〕24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1972年7月），页70—76。三叉飞机，原文如此，应为三叉戟飞机。
- 〔6〕赵炜：《西花厅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247。
- 〔7〕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562。
- 〔8〕本段及下段内容，参见南京军区《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大事记》（1986）。
- 〔9〕同〔8〕书，页165。
- 〔10〕意指怎么调到上海警备区的。李宝奇，原为陆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75年10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
- 〔11〕刘耀宗时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
- 〔12〕同〔8〕书，页170。
- 〔13〕同〔8〕书，页165—166。
- 〔14〕1976年2月后，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 〔15〕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页357。廖这里记忆有误，丁盛时为南京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彭冲，当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三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廖为书记，排名于张春桥、丁盛、彭冲之后。
- 〔16〕同〔15〕书，页389。
- 〔17〕同〔15〕书，页394。
- 〔18〕同〔15〕书，页363。
- 〔19〕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53—54。
- 〔20〕同〔1〕书，页342。

~~~~~  
【历史一页】

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下）

• 舒 云 •

（续上期）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这时，各组也都看到了“第六号简报”。整个会议的气氛被煽动起来了，各组都要求揪出反对毛泽东的坏人。大家的发言集中到有人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上，军队的中央委员们更是激动。正争先恐后地讲着，谁也没想到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李雪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对吴德说，会议立刻停止。吴德觉得意外，问：为什么停止？李雪峰只是简单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然后对大家宣布会议结束。散会路上，吴德再一次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议要停止？原来，江青带着十分惊慌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讲了很长时间，毛泽东生气了，一锤定音，说“第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李雪峰解释说，毛主席主持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并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刻停止。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作检讨。

虽然他们的检讨都是检讨，但检讨的层次和规模不大一样。陈伯达、汪东兴是在中型会议也就是所谓各大组长、各省负责人的会上作了检讨，重点是批陈伯达，同时也批吴法宪，联系到汪东兴。实际上，张春桥也在会上作了检讨。因为事先打过招呼，张春桥也就检讨了几句。传达他们的检讨也是有区别的。陈伯达和吴法宪的检讨被各组组长传达到每一位与会者，而张春桥的检讨没有传达，所以，很多与会者并不知道张春桥的检讨。在陈伯达作检讨的那个中型会议上，汪东兴没有检讨。汪东兴作检讨的范围很小，只是在六七个人的华北组正副组长会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明显在保汪东兴，也在保张春桥。

接下来的一阶段，会议的形势更严峻了，毛泽东宣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暗示陈伯达有历史问题，且口头上也说了对陈伯达的怀疑。这时，陈伯达已经是敌我矛盾了，全会集中批陈，揭发的炮火更加猛烈，集中开了四五次小组会。全会结束时，中央宣布要审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尽管庐山会议上“电闪雷鸣”，全会的公报却“风平浪静”，就几句话，主要是毛泽东的意思：“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懂马列主义的不多，不要被谣言诡辩欺骗”等等。看了全会的公报，谁也不会想到庐山上发生了一场被毛泽东称作“要把庐山炸平”的斗争。

“第六号简报”在庐山上就定了性，是“反革命”的简报。但是，简报与李雪峰和北京军区有什么关系，毛泽东一时还搞不清楚。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说，我们虽在庐山，但对这场斗争并不知情，只是觉得事情没有完。以后，陈先瑞才知道毛主席对庐山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爆发的斗争，并不只局限在对陈伯达的批判上，而是想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势力。这些办法，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抛石头”、“挖墙角”、“掺沙子”。不论李雪峰和郑维山在会上还是会下如何商量，总之，“第六简报”有阴谋。汪东兴检讨说，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简报，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看他是否事先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得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牵涉他很少，而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在汪东兴的第二个检讨中，又说想问李雪峰，李雪峰却没有正面回答。

当然，这时毛泽东还只是心里怀疑，还在考虑、观察。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中央委员们陆续下了山。毛泽东三天后离开庐山，先到江西南昌，然后在石家庄车站停了一下，找了包括李雪峰、刘子厚在内的五六个人询问情况。因为“第六号简报”出在华北组，要问一问来由。毛泽东并没交代意图，这五六个人有参加庐山会议的，也有没参加庐山会议的。大家都懵头懵脑的，李雪峰也如此，所以没答复毛泽东的疑问。毛泽东问，简报是怎么出来的？因为汪东兴在场，李雪峰认为这话毛泽东应该问汪东兴，不应该问他。在李雪峰当时的想法里，现在把“第六号简报”的责任往华北组身上推是不合适的，简报的责任应该属于汪东兴，而不

属于华北组。华北组发言，整理后由中办发简报。至于简报为什么印得那么快，更是中办的责任。但毛泽东认为，把事情往汪东兴身上推，这肯定又是一个阴谋。

李雪峰传达得很简单，也没讨论。毛泽东很大一个感觉，是李雪峰搞了鬼。关于毛泽东形成的这个观念，在以后得到了证实

庐山会议闭幕后，李雪峰传达中央指示：在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前，会议情况不准露出去。从庐山下来后传达庐山会议，只能讲会议公报精神，向主要领导人吹吹风。但会上的所有材料都不许带回，包括记录全收走了，而且只让传达到省部级、省军级，还要保密，这可让传达者犯了难。党政军一起还是分开传达？如果分开传达，北京军区怎么传达？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和司令员郑维山都觉得不好说，希望李雪峰一起传达算了。李雪峰说，我只能传达地方，军队由军队传达。当时华北驻军主要在河北，陈先瑞和郑维山退一步要求李雪峰在河北传达时向党政军一起传达。于是达成协议，河北党政军一起传达，华北其他地方的驻军由北京军区传达。传达时，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又讲了几句批陈情况。后来，不好好传达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总之，毛泽东形成很大一个感觉，是李雪峰搞了鬼。关于他的这个观念，在以后得到了证实。

国庆节后，中央决定在地市一级扩大传达陈伯达的问题，但华北地区没见到文件。又碰到头痛的传达问题了，郑维山打电话问李雪峰。他想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能知道得多一点。李雪峰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扩大传达。因为他在庐山上挨了批，心有余悸。讨论如何传达时，他认为还是从简为好。本着这个原则，华北还是只传达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向中央汇报得也很简单，说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就两句。康生在华北给中央的报告上批：奇怪？毫无揭发！遂将华北的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这更成了问题。江青鼓动北京军区内部揭发，于是出来了三十八军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毛泽东让江青把三十八军的人找到北京，搜集情况，写的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揭发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前两次在华北的乱说乱动。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批了该报告：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让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分管华北。他自称中央让他来解决华北地区的问题，两次来华北。以后，陈伯达倒台了，中央开会没人承认他分管华北地区的工作。到底陈伯达分管不分管华北地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分管华北，他到华北来是工作，不是阴谋。但中央内部的分工又没有形成文件，谁都不吭声。毛泽东批示没说陈伯达分管华北，而是说他插手北京军区。陈先瑞在回忆录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这除了中央能阻止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太上皇”一说也不是事实。从根本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当时全国各地的“太上皇”。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不存在“没有很好打通思想”的问题。三十八军的报告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是正确的，但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北京军区这不是事实。说“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保定问题”极其复杂，驻军与省军区各支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驻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而这个负责人是当时中央所信任的。所以“保定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陈伯达。

陈伯达到华北是解决地方问题的，并没有解决军队问题。他的两次华北之行，确实兴师动众，从北京军区到华北各省，都围着他转。不是陈伯达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他当时的位置摆在那里，中央第四号人物，当然是“太上皇”！李雪峰根本没想到应该揭发这个问题，陈伯达

来河北，基本解决了河北安定团结的问题，使河北省顺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如果这算问题，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而三十八军以此为“重型炸弹”，用党委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江青又画龙点睛，说陈伯达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这就下了结论。毛泽东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认为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在谈到解决措施时，他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角、掺沙子。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三十八军被整得更苦。……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角。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有，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等等。

陈伯达是陈伯达的问题，与李雪峰、郑维山没有关系；那时黄道霞才30多岁，也就三天，头发白了很多。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华北会议。但谁也没想到，华北会议越开越长。1970年11月至12月，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区党委会议，刚开始是全会，后来很快扩大到省军级。华北会议前期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被毛泽东认为批陈不痛不痒，同时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也被毛泽东批评，认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以后的华北会议被改组，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军委座谈会也被并入。毛泽东指示要李德生和纪登奎参加，后来，又加上黄永胜和李作鹏。黄永胜和李作鹏在庐山上沾了边，在内部也写了检讨，让他们来实际上是陪衬，主要是李德生和纪登奎，派他们来北京军区接班。1971年春节，历时一个多月的华北会议才宣布散会，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结论性讲话。此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批示，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

华北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学习三十八军的报告。实际上是让李雪峰和郑维山检讨。北京军区的领导懵了，大家都知道庐山上的事情“升级”了。果然，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慢慢地说李雪峰和郑维山是林彪的“大将”。这时，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改组北京军区了，但改组的命令不是在大会宣布的，而是在同北京军区主要领导人谈话时宣布的。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被任命北京军区政委，免去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李雪峰被开除党籍，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郑维山也被弄到安徽农场劳动去了。

华北会议分小会、中会、大会三种形式。小会是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参加，中会是省、市和军以上干部，大会是全体人员。大型会议由李德生和纪登奎主持。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批判了陈伯达，也严厉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时对刘子厚和陈先瑞的错误也进行了批判。会议要求李雪峰、吴德、解学恭、郑维山作检讨。吴德逃过了这一关。周恩来知道情况后，批评他没参加会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名？要他不用检讨，而是作一个揭批陈伯达的发言。汪东兴也过了关。他与毛泽东谈话后，认识到犯错误了，考虑写检查。周恩来说，你争取第一个写好检查。毛泽东看了汪东兴的书面检讨，专门和他谈了话，说这个检讨可以发到全会上，后经周恩来批改后就印发了。以后回到北京，汪东兴也在机关作了几次检讨，事情就算过去了。陈伯达问题株连到了李雪峰和郑维山。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一个阴谋。在此以前，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并且，陈伯达在唐山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批判刚开始时，李雪峰认为，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明明简报是综合大家的发言，怎么就成了他的问题了？但问题越搞越大，李雪峰也不得不紧张起来。周恩来叫吴德等人去帮助李雪峰。吴德认为李雪峰和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李雪峰到北京市工作还不到70天，还与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有对立情绪。但这时，谁也保不了李雪峰了。毛泽东让李雪峰自己在会上作检讨。李雪峰在会上就把自己大骂了一顿，让整简报的人都没办法整理。

华北会议逐渐从开始让李雪峰和郑维山作检讨变成批他们两个。他俩满头大汗地作了检讨也过不了关，关键是要追他们与陈伯达搞了什么阴谋。三十八军的报告只写了公开的东西，还有秘密的，涉及到“第六号简报”。但是，李雪峰与陈伯达根本没有阴谋，郑维山也没有。心里没鬼，也不知道“鬼”什么样，因此就没有办法满足上边。河北叫刘子厚揭发，北京军区叫陈先瑞、萧文玖揭发，而他们都不知道这中间有什么鬼，会议就僵住了。

三十八军揭发：“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写的，他一直跟着李雪峰，这中间有什么鬼，他应该知道。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说，叫黄道霞来。黄道霞没在会上，在会下，但每天开会他都知道。每天开会的情况，李雪峰都要问黄道霞是怎么一回事。黄道霞已知道会上很紧张，非打倒李雪峰不可。因为会上查陈伯达在石家庄讲了些什么，在华北地区都干了些什么，但时间一长就忘了。当时有一些记录，而且一批李雪峰他就犯糊涂，一发急，更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黄道霞说，我干脆回石家庄一趟，把记录拿来。前两天他就要回去拿，李雪峰没让他回去。如今到这份上，没有别的办法，李雪峰只好同意黄道霞回去把当时的记录拿来。反正河北驻京办事处有车，也方便，快去快回。这时，虽然周恩来叫黄道霞到会上来，但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叫他来。事不宜迟，黄道霞要了车，准备吃了中午饭就马上出发，连夜赶回来。谁想事情这么凑巧，黄道霞回石家庄的当天下午3点，江青到会上来了。她问：你们说的那个黄道霞来了吗？有人回答：来了，就在会下。江青说：那好，叫来。这一下傻了眼，要知道江青下午就叫黄道霞，那黄道霞就不会走。还是心里没鬼，也不怕鬼，觉得把当时的记录拿来，能说清楚，于是就理直气壮地回去取了。找不到黄道霞，江青追问：没来？怎么没来？河北省的刘子厚不得不说：他回石家庄了。江青急了，冲着陈先瑞大发脾气：他干什么去了？谁让去的？我已经知道，为什么逼他走？江青以为黄道霞因知道李雪峰的阴谋而将被灭口，马上对陈先瑞和萧文玖下命令：要活的，不要死的。陈先瑞说：我们有人跟着，不会发生问题的。与此同时，黄道霞到石家庄刚一进屋，警卫就告诉他北京有电话找他。黄道霞马上就明白了，他往北京打完电话，向爱人交待了情况，说：李雪峰一倒台我就要被关起来。随后，他三言两语写好了离婚书，让爱人在上边签字，爱人想也没想，把离婚书撕了。这时，警卫打来电话说：北京军区来人接你回去开会，门卫没让进。黄道霞要值班室找车马上回北京，一看表已经是夜里十一二点了。怎么刚来就连夜回去？有经验的人马上知道出了事。司机路不熟，绕到早上七八点才回到京西宾馆。这样，上边认为李雪峰又在搞阴谋，把黄道霞从石家庄带来的材料全部没收了，还规定李雪峰的秘书、警卫、司机都不能单独行动。李雪峰的窗户也被封了，外面另派警卫看着，黄道霞从石家庄回来也不让见。

这天上午不开会，刘子厚让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赵江告诉黄道霞下午上会发言。这时，会议已经从全会扩大到地市一级，河北省军分区的司令员、革委会的领导也来了，二三百人。但下午的会只是全会扩大会，没来那么多人，近100人参加。纪登奎、李德生、黄永胜、邱会作来了，李雪峰和郑维山也来了。江青和周恩来没来，但他们派了人来听。叶群没露面，在后边的屋里听。黄道霞讲了一下午，讲“第六号简报”是怎么出来的，讲李雪峰与陈伯达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关系……讲完，三十八军军长说，讲得很好。这个发言，黄道霞作了充分准备，讲了要让人相信，中心要破一个东西，还要实事求是。这是当年发生的事，当事人都在，有一点不合适，人家就会觉得你在编造，觉得整个不行。再次，就是要破掉人们头脑中自己是“追随李雪峰”的印象。当时，中央已定“陈李郑反党集团”，就想从黄道霞这里找到材料。但是“陈李郑反党集团”是莫须有的，陈伯达是陈伯达的问题，与李雪峰、郑维山没有关系。黄道霞最了解情况，但要事实来说话。为了这篇发言，黄道霞一个晚上没睡。那时，黄道霞才30多岁，也就三天，他的头发就白了很多。

黄道霞说，四号、五号简报送了，编了，但没排出来，所以没发；“第六号简报”为什么“加塞”？毛泽东的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

黄道霞讲完，觉得太累，回去吃完饭就睡了，一直睡到夜里十一点左右。纪登奎派秘书找他说：你今天讲得挺好，赶快整理出来。黄道霞就连夜整理了一个简报，讲明李雪峰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对简报比较积极。至于情绪高涨的原因，李雪峰自己也说不清楚，越批他越说不清。黄道霞认为，李雪峰有个错觉，认为陈伯达、汪东兴说的反对毛主席是天才，不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是康生，并不知道他们反的是张春桥。李雪峰还奇怪，康生在主持起草宪法，怎么陈伯达与康生打翻了？当时黄道霞也是这个看法。打倒康生，李雪峰当然积极，他与康生有点恩怨。“文革”开始时，康生找李雪峰的茬。李雪峰到北京新市委，与康生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康生在北京大学讲话时说，要撤掉李雪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6年8月，康生和陈伯达写报告给毛泽东，讲了很多应撤李雪峰职务的话。毛泽东把这个报告给李雪峰看了，过了两天，果然把李雪峰给撤了。毛泽东对李雪峰说，他们要撤，我认为不要撤，你不要管事，名义上管一管，实际让吴德他们管。就这样，李雪峰对康生很有意见。黄道霞讲这个背景，是为了说明李雪峰对康生不满，也说明陈伯达会前并没有与李雪峰打招呼。不用多说，自然就否定了他们是“反党集团”的说法。黄道霞的发言重点是讲“第六号简报”。他说，都是正常手续，没计划没准备，上边没弄清就批了。在中央全会上，各个组都要出简报。但毛泽东怀疑，你华北组已经出过一份简报了，六个大组一个大组出一份简报，再排到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最快也应该是全会“第七号简报”，而不应该是“第六号简报”。各个大组还没一轮，你华北组就抢先出了两份简报。一、二、三期简报印出来了，四、五期简报编了号还没印发，你“六号简报”就出了笼，不仅印出来还发了下去，这不是阴谋是什么？

黄道霞说：简报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管，这还牵扯到印刷，因为在江西，人不能去很多，怕失密。捡字只有一个工人，印刷两三个人。所以四号、五号简报送了，编了，但排字没排出来，所以就没发。而“第六号简报”为什么就能排出来？为什么“加塞”？毛泽东的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

华北组二号简报是黄道霞写的，不是李雪峰写的，也不是李雪峰交代写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没错，但这次在庐山会议上，黄道霞不是以李雪峰秘书的身份而是作为中办简报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华北简报组工作的。华北组负责简报工作的有3个人：一个是黄永胜的秘书王振，另一个是吴德的秘书，加上黄道霞。当时吴德的秘书另有任务，林彪让他写“活学活用”的经验材料。写简报的事情就只有王振和黄道霞了。王振是军里来的，写简报是新手，他就推给黄道霞，华北组第一个简报就是黄道霞写的。说到这儿，简报到底由谁负责就很清楚了，不是李雪峰的华北组，而是中央办公厅。由中办负责召集简报组，交代任务，提出要求。简报写好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签字，然后才能付印。黄道霞还讲了写这个简报的写作过程：汪东兴要快发简报，吃完午饭黄道霞就写，晚上还接着写，写了大半天才写完。这么赶主要是黄道霞还想听晚上8点的会。当晚的会议，李雪峰没有参加，到政治局开会去了。华北组开会前，黄道霞把写好的简报交给他，李雪峰说：先放那里，等我开完会回来再看。这说明也不是有阴谋，也不是赶时间赶快签发。

那天晚上，政治局的会议临时决定不开了，李雪峰回到华北组时小组会还在进行，黄道霞就把简报给了他。李雪峰问，陈伯达的简报稿送来没有？下午发言后，陈伯达要发简报，说快发快发，黄道霞编好了陈伯达的发言稿，他说还要再看一看，就拿走了。到下午会快开完时，陈伯达还没送回来。黄道霞问了一下，陈伯达说，还没改好。这样，李雪峰又把六号简报稿放下没看，坐在那里听小组会发言。小组会一直开到夜里11点多，黄道霞晚上7点多写好的简报稿已经在李雪峰那里压了4个多小时还没签发。小组会结束后，李雪峰、郑维山、汪东兴、解学恭、吴德等没立即离开。李雪峰问汪东兴：“今天这事毛主席知道吗？”汪东兴说：“知道。”看样子汪东兴是不想答复，起身就要走。吴德、解学恭都在场，黄道霞也在场。海军大将萧劲光看汪东兴要走，又追问一句：“汪主任，这是怎么回事？”汪东兴半开玩笑半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你老糊涂，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着呢。”说完，汪东兴就走了。



汪东兴走后，萧劲光也走了。李雪峰、解学恭、吴德等几人去吃夜宵，黄道霞也去了。吃完夜宵，黄道霞还惦记着简报的事，就问李雪峰签了没有。李雪峰问：陈伯达的简报呢？黄道霞说：催了，秘书说还没弄好。李雪峰说：这个简报我还没看，学恭你年轻，眼睛好，你看一看。解学恭是华北组副组长，就看了，提了两条意见：“陈伯达的稿子另发”，把这一句勾掉，免得提了留个伏笔，他的稿子来了，他发他的就行了；还有一个是陈毅在华北组有两次发言，简报上说了两句。解学恭说：简报上别提陈毅了，把这两句勾掉。李雪峰同意，黄道霞就勾掉了。本来简报还要让李雪峰再看看，李雪峰说：没带花眼镜，反正是如实记录会上的发言，你们就签字吧。解学恭先签了，李雪峰也签了。吴德说：我就不签了。李雪峰说：最好三人都签字，你签上吧。吴德也签了字。华北组6个组长、副组长，还有3个副组长没签。黄道霞给陈永贵打电话时已经是夜里12点了，陈永贵和郑维山都睡了。黄道霞没再找吴涛，便把简报亲自送到简报组，算完成了任务。

这么一说，基本把“第六号简报”说清楚了。李雪峰对简报积极是积极，但“第六号简报”并不是抢先，起码拖了四五个钟头。黄道霞说他自己倒是有抢先的情绪，因为根据简报要及时的要求，是想快点发，但实际上并没有抢先。后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扬了黄道霞，说：“这个秘书实事求是，有党性，他讲的和我们分析得差不多。”

给刘子厚写检讨，黄道霞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跟着陈伯达跑？讲明白这一点，就能顺利过关。刘子厚过了关，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雪峰在会上的检讨稿是黄道霞写的。在政治局会议上，李雪峰对周恩来说：我心里很乱，写不出来，叫黄道霞帮我写。周恩来同意了，说：“你有什么想法你说，让黄道霞帮你整理。”李雪峰的检讨说：犯了错误，让陈伯达在华北乱说乱跑，成了“太上皇”，上了陈伯达的当；陈伯达要发言，就让他发言。简报中，除了“反党集团”、“阴谋”外，李雪峰什么都认了。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江青都相信了，认为李雪峰说清楚了。只有毛泽东一人不相信。到了中共十大时，周恩来，甚至包括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李雪峰没大事，不应该划为林彪的“大将”，但还是开除了李雪峰的党籍。当时，专案组副组长纪登奎曾问周恩来：是不是和毛主席说一说？周恩来说：你代表我们去说。毛泽东说，不能原谅，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意思是李雪峰没说实话。黄道霞讲完“第六号简报”原由的第二天，纪登奎找黄道霞谈话。他相信黄道霞讲的，说，你发言的简报江青也看了，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不信。毛泽东还是想打倒李雪峰，还想划成“集团”。这时，毛泽东已经有点怀疑汪东兴了，说：你怎么还在华北组？是不是在山下时他们就同你商量的？汪东兴坚决否认。

后来，纪登奎代表江青第二次找到黄道霞说：江青觉得你讲得很好，但还要再深入一些揭发，有什么遗漏？他又问：李雪峰为什么让你回石家庄取材料。黄道霞说：因时间太长，李雪峰记不住了，担心怀疑他捏造的，所以要找当时的记录。纪登奎说：恐怕没这么简单，是准备翻案的吧？纪登奎让黄道霞把小组会上发言的那些人排个次序，弄清楚都有谁发言，讲了些什么。这一次谈话没谈完，纪登奎的秘书说毛主席叫他，纪登奎就走了。第二天，纪登奎又来找黄道霞进行第三次谈话。这一次纪登奎的口气变了，说：毛主席认为没那么简单，毛主席最大的不相信还是认为“第六号简报”有问题。后来开批判会，周恩来加上了黄道霞的名字，叫他在大会发言，进一步揭发。这让黄道霞很为难，他已经把所知道的全在会上说了，再没有别的发言，只好大而化之，说了些阶级斗争理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之类的空话、套话，又联系陈伯达在华北的活动，应付过去。

这时候，陈伯达已经被揪出来了，明确说他是反革命。从庐山上下来，已经有揪林彪的苗头了。李雪峰和黄道霞都明白，又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一次，由周恩来主持，开了一个小

会，十几个有关人员参加。周恩来首先问：黄道霞是哪一个？虽然见过多次，但印象不深。周恩来又问：黄道霞有什么意见？黄道霞说：对结论没意见，同意。还补了一句：我也有错误。周恩来没听清，黄道霞又说了一遍。周恩来点点头。这时，已经决定让刘子厚接李雪峰的班，李雪峰的三个秘书留在北京。那时，黄道霞算北京军区司令部的编制，还穿着军装，他提出脱军装回河北。周恩来批示：军装先不要脱。周恩来保黄道霞过了关，不让他脱军装。黄道霞以为脱了军装，事情就算完了，现在不让脱，也算完也不算完。黄道霞把简报说清楚了，解脱了北京军区一大帮人，在周恩来眼里，黄道霞有党性，是立了功的。

虽然黄道霞当时没脱军装，还是回到了河北。他穿军装一直穿到毛泽东去世。河北第二把手刘子厚接了李雪峰的班，但也背上了包袱。在华北会议上，刘子厚曾说：“小黄，我这第二把手还不如秘书。”李雪峰的检讨是黄道霞写的，但是毛泽东那里没通过。李雪峰算是刘邓的骨干，“文革”初期批刘邓，他赶快检讨，划清界限。李雪峰是文人出身，点子多，但平时办事谨慎，尤其刘邓被打倒后，尽量想爬出来，生怕犯错误，工作兢兢业业。那时，李雪峰的检讨也全是黄道霞写的，什么“思想上与刘邓有共性”等。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市委机关大会小会上作了很多检讨。1966年12月，毛泽东亲自批了李雪峰的一个检讨，说“刘邓集团不要捆在一块”。

其实，上边给了李雪峰好多机会，只是李雪峰没有意识到。他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说明白。如果在庐山上和毛泽东说了，或者毛泽东路过石家庄说了，恐怕就会好得多——在庐山上，毛泽东曾说李雪峰你这个组长怎么当的；路过石家庄时，毛泽东已经怀疑陈伯达在“第六号简报”中起了什么作用；直到后来扩大会议上各地写揭发陈李关系的报告。在这一段时间里，李雪峰都有机会，却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

黄道霞回到河北后，帮刘子厚写检讨，接受了教训。写上了李雪峰紧跟陈伯达，刘子厚紧跟李雪峰。还写了陈伯达说分管河北就相信了，陈伯达到河北指手划脚，认为是为河北好，相信是为了解决河北的派性，一碗水端平地解决了河北的武斗问题。毛泽东对刘子厚的检讨是满意的，认为刘子厚说了一点心里话，批了“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一段话。毛泽东抓住这一点，说，李雪峰没说这个，没说心里话。虽然黄道霞帮李雪峰写的检讨没写这个，实际上李雪峰也不相信陈伯达。只是李雪峰在老人家那里吃不开，陈伯达给李雪峰靠近乎，李雪峰又上了当。当时，捅破这个很容易，有很多根据。可是黄道霞自己不能说，他一说就成了揭发，而李雪峰可以说，当然后来说就晚了。那时，只有一个机会，就是知道江青、康生打三十八军的主意后，赶快起来揭发陈伯达。给刘子厚写过检讨后，黄道霞才恍然大悟：你要符合老人家的意思，为什么跟着陈伯达跑？讲明白这一点，就能顺利过关。果然刘子厚过了关，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还批了他的检讨，认为很好。

九届二中全会已经过去30多年了，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对陈伯达列举的种种“罪行”以及揭发批判有许多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李雪峰、郑维山工作上虽有缺点、错误，但与陈伯达是一般工作关系，说他们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先后为郑维山和李雪峰平反，并恢复了李雪峰的党籍，同时也为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平了反。

□ 原载《党史博览》2005.2

~~~~~

【知情者说】

陶铸在1966

• 马恩成 •

我是1966年4月调离陶铸办公室的。离开后虽仍在中南局机关工作，但和陶铸的接触就很少了，只能通过有关会议知道他的一些观点和动向。有几个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关键性的，其中一些内容又是鲜为人知的，因此很值得回忆。

◇ 突然给自己扣上“右”的帽子

陶铸上调北京前作的最后一次报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一些议论。这就是1966年5月19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上万人的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人们意料，陶铸检讨了自己“右的偏向”。

陶铸说：“在1962年之前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工作问题上，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

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陶铸指出的这两点，即他曾经推行过田间管理的责任制和在话剧歌剧创作会上的讲话，当时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因此提高了陶铸的威望。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现在却否定了，还给自己扣了“右”的帽子。这不能不引起干部们的震动，似乎“文化大革命”一来，过去很多正确的东西都错了。陶铸在讲话中还提出“要保持晚节”，说“我个人没有旁的要求，就是要求死了以后，能够在骨灰罐上写上‘中国共产党陶铸’。”为什么讲这些？是否有什么不祥的预感？更引起干部们的纷纷议论。这时又听说陶铸即将北调中央任宣传部长，其夫人曾志和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都不以为然，认为陶铸是粗线条式的人物，不适宜任中宣部长……

陶铸北上前夕，曾志又患了甲状腺亢进。我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他们。只见曾大姐躺在病床上，陶铸正在收拾一堆书籍。他见了我没有多讲什么，却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我毫无思想准备，就支支吾吾地说：“好像是一次比反右派还严重的运动！？”他想了一下说：“有一定道理。”陶铸当时为什么这样问我？是测验我清楚不清楚，还是他自己也有些不清楚？至今对我仍然是一个谜。

◇ 一夜之间跃居第四把交椅

1966年7月中旬，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告诉我，中央于7月底召开工作会议，接着还要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要我跟他去参加会议搞简报。当时“文化大革命”涉及的面越来越宽，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人眼花缭乱，心中无底，我也想趁此去弄个明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7月27日到30日，只开了三天，实际上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

备会。会上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征求意见。会上印发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材料，即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以及毛泽东给以热烈支持的信。当时刚刚见到“红卫兵”这个词，对他们强调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越乱越好”等等感到有些绝对，但看到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就不敢再多想，更未料到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了。

这次会议为了使大家开阔眼界，还组织了两次参观活动。一是到北师大参观大字报。那里从校园到课室楼梯，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谭厚兰对工作组的造反展开辩论，多数是揭发批判，少数给以支持，这可能反映了文革初期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清华大学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这个会颇具规模，周总理、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和各大区的领导坐满了主席台，台下草地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全校师生。会议先由学生发言，绝大多数还是批评蒯大富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的发言，因为他批判得最系统，也因为他的相貌举止很像他父亲。蒯大富也发了言。他跑步登台，好像全不把别人的批评放在眼里，情绪激昂地讲了一番。因为他讲话很快，又是浓重的江浙口音，具体讲什么听不清楚。最后由工作组长叶林作了检讨，并宣布为蒯大富平反。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召开，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批中央一些人事变动的名单。一开始印发的名单只有两人，一是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二是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会议开始，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还讲了一些国内国际的情况。北京大学写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等7人也以革命师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前期大家主要围绕着《决定》草稿发言，有的泛泛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有的在推敲文件词句，气氛还比较平和。到8月4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问题，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后，大家感到问题严重，会议开始升温。8月7日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会议掀起巨澜。大家都感到很突然，没想到党内高层第一把手会贴第二把手的大字报，而且用词十分尖刻，并公开指称党内存在另一个“司令部”，还算老账，提出要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说得如此严重，是否问题的性质有了变化？代表们心中无底，而小组讨论时还要表态，更使大家紧张起来。怎样表态？按一般的内部矛盾讲，怕调子低；按敌我矛盾讲，又想不通，怕过了头。这一个夜晚，北京饭店大部分房间灯火通明，有的在独自思索，有的在三三两两地议论……第二天的发言却较简短，有的只按毛主席的口径空洞地表态，有的仍然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就事论事地批一番，也有的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只有江青、康生等少数人在那里推波助澜。陈伯达的一篇拥护《炮打》的大字报，作为正式文件印发会议。

会议的又一个波澜，是两天后毛泽东提交会议酝酿讨论的政治局常委的新名单。这个名单的排列十分出人意料。一是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取消了党的副主席和接班人资格，这么快就对刘少奇采取组织措施，谁也没有料到；二是林彪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一个长期养病，没有做多少工作的人，这次却排在日夜操劳、威望很高的周总理前面，令人费解。更出人意料的是，陶铸由一名中央委员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排在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的前面。为什么这样超越提升？代表们见到陶铸便向他打听情况。陶说：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单时我也很突然，立刻报告毛主席，请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主席答复说，名单已定，不更动了。

这次中央全会，陶铸除有时参加小组会外，还找中南地区的领导开了几次会。一次是发动各省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来北京工作，支持一下新组建的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一

次是研究怎样结束农村的“四清”运动，强调要有始有终，搞好生产。还有一次是因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来京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研究如何做好交接工作。看来，陶铸这时尚未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化大革命”中来。

◇ 不到半年又成了要打倒的“第三号”

1966年10月份，“文化大革命”已发动起来，红卫兵们已不满足于破四旧、抓“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机关，到处揪“走资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思想抵触，和造反派出现顶牛状态。毛泽东为了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于10月9日起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是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也是文革期间最后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我随薛光军同志作为简报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再按大区编组，而是把各地打乱重编。组长也不再由各大区领导担任，而是由军队的老帅、老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担任。中央文革还组织一批军队干部任会议的工作人员。会议地点亦由北京饭店改为军队的京西宾馆。

我当时被分到第二组。组长是叶剑英元帅，副组长是杨成武、张春桥。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开始由林彪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大搞……要闹得人们睡不着觉”，要对干部“全面观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几天后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指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在会上和全国印发。

但是，会议代表对这样上纲上线多数不理解，有的还对造反派的冲击有怨言。如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发言说：现在群众分成两派，这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支持，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张春桥听后马上指责说：群众的一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派保守，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两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线是非，“和稀泥”。又如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发言中批评一名副市长，说他身为高级干部，却勾结红卫兵围攻市委，致使第一书记万晓塘心肌梗死。这一发言在下一阶段被重点批判。从会议简报中看到，身为组长的陈毅元帅，也带头对造反派的冲击表示不满。这些情况使毛泽东认为会议“调子低”，有的发言“不大正常”，遂确定延长会期，对“抵制造反”的重点人物进行批判，使会议温度陡然升高。

于是在第二组，赵武成就成了重点。为了进行批判，康生来参加会议，还让天津那位副市长与会作重点发言。他历数了以万晓塘为首的天津市委如何与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顶牛的情况。当讲到万晓塘猝死，拥护市委的一派群众上街游行时，康生声色俱厉地指着赵武成说：“你们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公开反对毛主席！”赵武成原是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我们曾经一起开过会，知道他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这时只见他面色苍白，汗珠连连滚落。我真担心他会当场晕倒。在这种压力下，赵不得不一再检讨。由于当时天津市归河北省双重领导，致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跟着检讨“路线错误”。

从会议简报中得知，当时其他组受重点批判的，还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华东大区则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各组的批判火药味很浓，都上纲上线。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会不按大区编组，原来每个大区都有主要领导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事先的设计。

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我们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铸同志发言？张说：陶铸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了，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铸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这次会议原定开7天，实际开了20天才结束。会议后期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联系历史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毛泽东最后讲了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点起来的。批转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我不是要打倒你们，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讲话的调子比林彪、陈伯达和缓。小组最后讨论时，各省代表大多愁眉苦脸，认为回去后日子更难过。果然，这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凶猛地燃烧起来，各地造反派更加横冲直撞。会后各省代表有的一下飞机就被揪走，有的省召开几级干部会也被造反派冲垮。社会出现大动乱，经济秩序被破坏，党政领导机关开始瘫痪、半瘫痪。到了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江青、陈伯达公开点名，成为“打倒刘、邓、陶”口号中的第三号人物。

□ 《百年潮》1999. 11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